

十六国北朝时期敦煌 令狐氏与佛教关系探究

孔令梅 杜斗城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 甘肃 兰州 730020)

内容摘要:令狐氏是敦煌大族之一,自汉代徙入敦煌后逐渐成为儒学经术世家。北凉灭西凉后,令狐氏开始为人抄写佛经,接触佛教,由以儒术传家的传统大族转变为儒释兼通的新型大族。北朝时期,令狐氏在官方佛教写经中起着主导作用,且信仰佛教,与佛教的关系更加密切。这一切很好地反映了汉晋北朝时期敦煌大族与佛教的关系情况。

关键词:十六国北朝;敦煌;令狐氏;佛教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0)05-0099-06

A study of LINGHU Clan of Dunhuang in Sixteen Kingdoms Period and the deep relationship with Buddhist Activities in Dunhuang

KONG Lingmei, DU Doucheng

(The Dunhuang Studies Institute of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20)

Abstract: LINGHU clan was one of big celebrated family at Dunhuang and famous for their deep foundation knowledge of Confucian when they migrated to Dunhuang in the Han dynasty. When the Northern Liang eliminating the West Liang Dynasty, LINGHU clan began to join in activities of copying Buddhist Scripture and contacted Buddhism and began their transi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family to a new type of family that grasping both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During the long period of Northern Dynasties, LINGHU clan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official activities in copying Buddhist Scripture and became an early family who belief in Buddhism. A study of LINGHU clan could reveal the famous big family along Hexi Corridor contact with Buddhism during the Han Dynasty to the Jin Dynasty until the Northern Dynasties.

Key Words: Sixteen Kingdoms Period and Northern Dynasties; Dunhuang; LINGHU Clan; Buddhism

收稿日期:2010-02-22

作者简介:孔令梅(1982—),女,山东省曲阜市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2008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敦煌学、佛教史研究。

杜斗城(1951—),男,甘肃省灵台县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敦煌学、宗教学、考古学研究。

十六国北朝时期是敦煌大族思想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佛教自汉代传入敦煌后,不断发展壮大,十六国时期以来逐渐被敦煌大族接受和信奉,敦煌大族的思想文化从独尊儒术发展到儒释兼行。其中,令狐氏是敦煌大族思想文化发生变化的典型代表。本文主要探讨十六国北朝时期敦煌令狐氏与佛教的关系,分析令狐氏在此时期不同阶段内的佛教文化特色。

一 北凉敦煌佛教与令狐氏文化角色的转变

西汉末年因避王莽之祸令狐氏家族由中原徙入敦煌,东汉时期其以儒家文化为特征的敦煌大姓地位得以确立^[1]。确切地说,自东汉中期以后敦煌令狐氏完成了从武力军功到文化世家的转变^[2]。汉至十六国前半期,敦煌令狐氏在政治、文化上都很显达,尤其是令狐氏的儒术世家特征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敦煌大族。公元421年北凉灭西凉,敦煌处于北凉统治之下。关于北凉时期敦煌令狐氏的仕宦情况史载少有发现,可以推测令狐氏家族已经不受北凉统治者所重用,处于消沉时期。为了生存,令狐氏开始谋求新的发展道路,接受佛教正是他们解决现实不顺的良药。

作为佛教中转站的敦煌,佛教气氛非常浓厚。敦煌“悬泉浮屠简”的发现,说明1世纪下半叶佛教就已传入敦煌^[3]。“敦煌菩萨”竺法护翻译不少佛典,弟子竺法乘在敦煌立寺延学^[4],促进了敦煌佛教的传播与发展。晋司空索靖题壁“仙岩寺”,秦建元年中始有乐僊、法良造窟,这是关于莫高窟的早期记载。五凉时期敦煌佛教迅速发展,“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5],尤其是北凉沮渠氏时期,大量翻译佛经,造塔建窟,使得北凉一时成为一个“弘化护法”之国^[6]。在这样的佛教背景下,一向以儒学经术传家的令狐氏开始接触佛教。

从敦煌吐鲁番考古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令狐氏接触佛教的早期情况。

(1)北凉马德惠石塔题记:

令狐颯书。承阳二年岁在丙寅(426)
次于鹑火十月五日,马德惠于酒泉西城
立,为父母报恩。^[7-8]

马德惠石塔出土于酒泉城内西南,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石塔腹身刻有经文和题记,共33行,每行6至8字不等。所刻经文为《增一阿含经·结禁品》,

29行,与经文同行接着是“令狐颯书”,最后是4行塔主人马德惠的发愿文。塔上刻有“承阳二年”,据朱雷先生研究,北凉奉夏正朔,“承阳”就是夏之“承光”,“承阳二年”即是426年^[9]。北凉时期令狐氏担任刻经人的角色,为佛教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2)《妙法莲华经·方便品》写经题记:

岁在己巳(429)六月十二日令狐岌
为贤者董毕狗写讫校定。^[10]

此经藏于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题记后面有庚戌三月十一日仲父跋语:“案:己巳为宋元嘉六年、北魏神䴥二年、北凉沮渠蒙逊之承玄二年也。当时写经卷子多出中国人手,草致奇譎,大半相类。上接隶体,下开北魏一派,一见而知为北凉书法也。”此经系北凉承玄二年(429)令狐岌所抄,同样展现了北凉令狐氏为人抄经的情况。

(3)《佛说首楞严三昧经》下写经题记:

清信士史良奴所供养经。维太缘二
年岁在丙子(436)四月中旬,令狐广嗣于
酒泉,劝助为优婆塞史良奴写此经。^[11]

据黄文弼先生介绍此经系1930年袁复礼在迪化(乌鲁木齐)时鲍尔汉所赠,出土于吐鲁番,属于六朝写本。据殷光明专门对年号的研究,“太缘二年”就是北魏“太延二年”(436)^[12]。此经由令狐广嗣在酒泉所写,然后传入吐鲁番。表现了北凉中期令狐氏作为写经人的身份为人抄写佛经的情形。

(4)北凉程段儿石塔题记:

劝书令狐广嗣。凉太缘二年岁在
丙子(436)六月中旬,程段儿自惟薄福,
生值末世,不观佛典,自竭为父母合家立

敦煌文献S.1889《敦煌记氏家传并序》记述了东汉以令狐湊、令狐富为代表的令狐氏儒学修养情况。《晋书》卷86《张轨传》载,令狐亚、令狐洸是前凉富有才干的重臣;卷87《李玄盛传》记载了西凉令狐溢、令狐迁、令狐赫分别被委任重要官职。这些材料很好地表现了令狐氏儒宦高门的形象。

此据莫高窟第156窟前室北壁《莫高窟记》,《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72页。敦煌文献P.3720v《莫高窟记》也有类似记载。据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第83—84页73号录文标注该文书出土于吐鲁番。

据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第83—84页73号录文标注该文书出土于吐鲁番。

“广”的繁体字“廣”和“廉”形似,殷光明先生《北凉石塔研究》第37页误录作“廉”。

此石塔形象,愿以此福成无道,并及命过秋,官女妻陵男亦同上愿。^[13]

程段儿石塔出土于酒泉城内,藏于酒泉博物馆。石塔腹身刻有经文和题记共28行,每行7至12字不等。所刻经文是《增一阿含经·结禁品》,22行,与经文同行接着刻写“劝书令狐广嗣”,最后是6行塔主人程段儿发愿文。此塔是程段儿为“父母合家”,愿“成无道”而造,刻写人是令狐广嗣。造塔时间是“凉太缘二年岁在丙子六月”,与本文(3)中四月中旬,令狐广嗣于酒泉劝助为优婆塞史良奴写《佛说首楞严三昧经》的时间相差两个月。可见令狐广嗣作为职业抄经手经常为人抄刻佛经。

上述两座石塔题记和两件佛经抄本是令狐氏接触佛教的早期记录。令狐颯、令狐岌、令狐广嗣都是经文抄刻人,他们为供养人马德惠、董毕狗、史良奴、程段儿抄刻佛经。古代信众发愿供养,请人抄经现象非常普遍。敦煌令狐氏正是信众们合适的抄经人选。这是因为敦煌令狐氏自东汉中期以来就形成了儒术传家的传统,儒风雅士辈出,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为其从事佛经抄写工作提供了优势条件。令狐氏离开北凉政权舞台后,为了生存,开始为广大信众抄写佛经,跟佛教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从而由以儒术传家的传统大族转变为儒释兼通的新型大族。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佛教重禅修,令狐氏所抄写的佛经《佛说首楞严三昧经》、《妙法莲华经》等具有显著的时代特色。《首楞严三昧经》是大乘禅法最重要之经典,讲求佛德坚定,有助于参禅打坐。《妙法莲华经》宣扬造塔筑寺、抄写佛经,在此经的宣传下信众抄经信仰之风盛行。令狐氏为人所抄写的这些佛经正是当时佛教信仰之风的具体反映。石塔是寺院内供奉之物,由世俗施主造好后施舍给寺院,供僧侣观像或信徒礼拜之用^{[6]235-236}。两座石塔上所刻佛经都是《增一阿含经·结禁品》,其“‘十二因缘’是成佛的重要阶梯,在禅定中观十二因缘,认识三世因果相续的道理,以对待愚痴,佛教还主张定慧双修,由定生慧,以慧观达真理,决断疑念,斩除妄想,从而获得解脱”^[14]。它是小乘经典,适应了当时禅观双修的信仰风气。令狐氏抄写此经正是在北方“统一的宗教思潮影响下,在同一时期集中建造的”^[8]。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由敦煌令狐氏所刻写的两座石塔都出土于酒泉,由他们所抄写的佛经皆出土于吐鲁番。这是因为敦煌令狐氏的祖先在汉代王莽之乱时西迁,徙

入之地就是敦煌,然后令狐氏在河西及西域各地为官仕宦^[15]。从姓氏书及吐鲁番出土墓志看,令狐氏都以敦煌为郡望。故而在河西、西域等地发现了北凉时期敦煌令狐氏与佛教关系的材料。

可以说,在前凉、西凉等政权中,令狐氏主要是儒宦世家,彰显尊严与威望;北凉统治时期,敦煌令狐氏官场失势,他们寻求新的发展道路,为人抄写佛经,传播佛教,敦煌令狐氏的文化角色发生变化,实现了由儒学独尊到儒释兼通的变动。

二 北魏敦煌镇官写经事业与敦煌令狐氏家族

北魏时期,《魏书·释老志》有这样的描述:“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虽有太武帝灭佛,但是北魏大多数统治者还是推崇佛教的,当时社会从上至下形成了崇佛的风气,佛教在敦煌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

439年,北魏进攻凉州,灭北凉,442年开始统治敦煌,此时令狐氏家族的命运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令狐氏重新得到统治者的重用。据《周书·令狐整传》载,该家族“世为西土冠冕”,整曾祖嗣、祖诏安皆仕于北魏,“官至太守”。其父虬,约在北魏末至西魏“仕历瓜州司马、敦煌郡守、郢州刺史,封长城县子。大统末,卒于家”,“赠龙骧将军、瓜州刺史”^[16]。北魏时期,令狐氏家族在敦煌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家族势力重新振兴。

佛经抄写的繁荣是佛教迅速发展的标志。北魏写经可追至“魏太祖道武帝于虏地造十五级塔,又立开泰定国二寺,写一切藏经,造千金像,三百名僧每月法集”^[17]。这是北魏最早的佛教写经记载,具有官方写经的性质。在北魏崇佛的风气下敦煌地方官方写经出现。敦煌令狐氏在官方佛教写经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敦煌文献中,官方佛教写经文书主要集中在511—521年间,大约有21件(表1)。其题记有着基本一致的书写形式,如S.2067《华严经》卷16题记:

1. 华严经卷第十六
2. 延昌二年岁次水巳(513)七月十九日、敦煌镇经
3. 生令狐永太写此经成讫
4. 用纸廿四张
5. 校经道人
6. 典经帅令狐崇哲^[18]

表1:北魏官方佛教写经文书题记

	时间	(官)经生	典经帅	校经道人	出处
1	永平四年(511)	曹法寿	令狐崇哲	惠显	S.1427《成实论卷十四》
2	延昌元年(512)	刘广周	令狐崇哲	洪俊	S.1547《成实论卷十四》
3	延昌二年(513)	曹法寿	令狐崇哲	佚名	《华严经卷四十一》
4	延昌二年(513)	令狐礼太	令狐崇哲	佚名	新0672《大方广华严经卷八》
5	延昌二年(513)	马天安	令狐崇哲	佚名	《摩诃衍经卷三十二》 ^[19]
6	延昌二年(513)	令狐崇哲 (经生帅)	——	佚名	P.2110《大方广佛华严经·离世间品 之二卷三十五》
7	延昌二年(513)	张显昌	令狐崇哲	佚名	S.341《大楼炭经卷第七》
8	延昌二年(513)	令狐崇哲 (经生帅)	——	佚名	S.9141《华严经卷第三十九》
9	延昌二年(513)	张显昌	令狐崇哲	佚名	散0705《华严经卷第四十七》 ^[20]
10	延昌二年(513)	令狐永太	令狐崇哲	佚名	S.2067《华严经卷第十六》
11	延昌二年(513)	张乾护	令狐崇哲	佚名	《大智度经卷第十二》 ^[21]
12	延昌二年(513)	令狐崇哲 (经生)	——	佚名	散0193《华严经卷二十四》
13	延昌三年(514)	张阿胜	令狐崇哲	佚名	S.6727《大方等陀罗尼经卷第一》
14	延昌三年(514)	令狐崇哲 (经生帅)	——	佚名	P.2179《成实论卷第八》
15	延昌三年(514)	曹法寿	令狐崇哲	佚名	新1442《大品经卷第八》
16	延昌三年(514)	曹法寿	令狐崇哲	佚名	《大品经卷第八》 ^[22]
17	神龟元年(518)	张凤鸾	——	——	上图035《维摩诘经卷上》
18	神龟二年(519)	令狐世康	——	惠敞	《摩诃衍经卷三十一》 ^{[19][11]}
19	——	令狐世康	——	——	散0718《杂宝藏经卷第十》
20	——	令狐世康	——	——	BD.06846《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21	正光二年(521)	李道胤	——	——	S.4823《十地论·初欢喜地卷第一》

可以发现敦煌官方佛教写经有着基本固定的工作分工,(官)经生、典经帅、校经道人各负其责,参与其中。其中,令狐氏家族人员在官方佛教写经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

首先是经生或称为官经生,负责抄写佛教经文。经生人员比较复杂,他们来自于敦煌各个家族。在511—514年的16件写经题记中,经生有令狐崇哲、令狐礼太、令狐永太、曹法寿、张显昌、张阿胜、张乾护、马天安、刘广周等等。他们代表的这些

家族在当时大多属于敦煌大族之列。在这些经生中,令狐氏和张氏皆占33.3%,曹氏、马氏、刘氏各占11.1%,可见令狐氏经生所占的比例最高。514年以后,所见的5件写经文书中经生有张凤鸾、令狐世康、李道胤等,可以说北魏后期令狐氏家族人员

藏于故宫博物院,《文物》1963年第4期,第34页图12。

表格中第12号写经题记的写作形式跟第6、8、14号形式同,其“经生”之后似漏“帅”字。

在写经工作中依然占据重要地位。

其次是典经帅,此称谓不见史载,但“典经”一词常见于佛典,《中阿含经》卷40:“彼四十八年行童子梵行,欲得经书,诵习典经。”^[23]典经应是指佛经。《说文解字·巾部》:“帅,佩巾也。”帅,乃主帅之义。可以推断典经帅就是管理佛经抄写工作的负责人,是官方佛教写经事业的管理者和领导者。从现存的官方佛教写经题记看,511—514年间,典经帅职务全由令狐崇哲来担任,他负责管理此时期的官方佛教写经事业。作为典经帅的令狐崇哲同时也是经生帅,他亲自抄写佛经,为经生提供示范。在敦煌文献中有4件令狐崇哲的写经,如表中第6、8、12、14号写本。可以说典经帅职位主要由令狐氏家族人员担任,敦煌令狐氏在北魏官方佛教写经事业中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

最后是校经道人,其身份为僧人,对官方佛教写经进行检查校对,保证经文的正确性和质量。上述21件文书中有校经道人署名者只有3件,且未见俗姓,故此处不作过多讨论。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敦煌令狐氏在北魏敦煌官方佛教写经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从典经帅到经生都有令狐氏人员担任,他们或领导敦煌官方佛教写经工作,或在经生中占据着很高的比例,为敦煌官方佛教写经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促进了北魏敦煌佛教的迅速发展。

除了官方佛教写经,敦煌令狐氏信众私人抄写佛经也非常普遍。如:

1. 太平真君七年(446),令狐算在唐儿祠写《大集经》卷23,为诸佛弟子祈愿^{[22]6}。

2. 敦研113号北魏天安二年(467),令狐儿等三人习书《维摩经》^[24]。

3. 正始二年(505),清信女令狐陀咒供养《妙法莲华经》卷4^{[22]7}。

4. P.2078信士张双周为亡妻令狐姬供养《佛说观佛三昧经》卷4^[25]。

北朝佛教禅观双修,《大集经》、《法华经》、《维摩经》、《佛说观佛三昧经》等大乘经典流行于北朝信众之中。令狐氏或研习佛典,或抄经供养,这些都很好地反映了北朝时期的佛教信仰状况,同时也反映了敦煌令狐氏与佛教的密切关系。

三 东阳王元荣时代敦煌令狐氏的佛教信仰

北魏孝昌元年(525),宗室元荣被封任瓜州刺史,从此元荣治理敦煌长达17年^[26]。此时,令狐氏家族给予元荣大力支持,也深受元荣器重,被其称为“西州令望”。令狐整被元荣“辟为主簿,加荡寇将军”。534年,“魏孝武帝西迁,河右扰乱”,令狐整帮助元荣稳定了瓜州的局势。整的弟弟令狐休“起家太学生”,546年,与兄整起兵逐张保之乱,维持了敦煌当地的秩序和中央的统治权威^[16]。

元荣治理敦煌功绩卓著,同时他也非常崇信佛教,建造莫高窟,供养大量佛经,表达着他保境安蕃、早还京国愿望。深受元荣影响,令狐氏佛教信仰持续发展。令狐休早年就读于太学,在其间也有机会跟佛教接触。西魏大统三年(537),他把中京洛阳智严法师供养的《东都发愿文》传抄至敦煌。敦煌文献P.2189《东都发愿文》题记:

大统三年(537)五月一日,中京广平王大觉寺涅槃法师智严供养《东都发愿文》一卷。仰奉明王殿下在州施化,齐于受称之世,流润与姬文同等,十方众生同含生,同于上愿。令狐休宝书之。^[27]

饶宗颐先生最先对发愿文题记做了分析,认为令狐休宝即是令狐休,为敦煌令狐整家族的同族,明王殿下就是东阳王元荣^[28]。孙晓林先生对其做了进一步研究,认为此文书“系令狐休在弱冠前后的大统三年所书,抄写地点在敦煌”,题记颂文盛赞了东阳王元荣在敦煌的施政^[29]。令狐休抄《东都发愿文》来赞颂元荣的统治,可见令狐氏、元荣与佛教的关系都是非常密切的。大统五年(539)令狐休又为“流通末代也”抄《大般涅槃经义记》卷4^{[21]121}。《涅槃经》系北凉昙无讖所译,“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思想为禅宗所大力弘扬,此经译出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广被信众所接受^[30]。令狐休抄写《大般涅槃经义记》正好适应了当时佛教信仰的潮流和需要,有助于提高令狐氏的佛教信仰水平。可见,令狐休儒释兼通,且佛教信仰非常虔诚,是敦煌令狐氏佛教信仰的突出代表。

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第96页把文书时间定在5世纪。

四 结 语

总的来说,敦煌令狐氏家族与佛教的关系在北朝敦煌大族中具有典型性。汉晋敦煌令狐氏是传统的儒术世家,自北凉统治敦煌,低调发展的令狐氏家族开始接触、信奉佛教,他们作为经生,为普通信众抄写佛经,在新的思想领域寻找到家族的希望,其文化角色发生转变。北魏灭凉后,令狐氏重新得到统治者的重用,家族重新振兴,令狐氏与佛教的关系更加密切,他们在敦煌佛教官方写经事业中作用突出,且其佛教信仰不断发展,为敦煌佛教的发展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孙晓林.汉一十六国敦煌令狐氏述略[J].北京图书馆馆刊.1996(4):92-96,24.
- [2]冯培红.汉晋敦煌大族略论[J].敦煌学辑刊.2005(2):100-116.
- [3]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M].兰州:甘肃文艺出版社,2009:185-194.
- [4]慧皎.高僧传[M].汤用彤,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23-25,155.
- [5]魏收.魏书·释老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3032.
- [6]杜斗城.北凉佛教研究[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8.
- [7]史岩.酒泉文殊山的石窟寺院遗址[J].文物参考资料.1956(7):53-59.
- [8]张宝玺.甘肃佛教石刻造像[M].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42.
- [9]朱雷.出土石刻及文书中北凉沮渠氏不见于史籍的年号[C]//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古文献研究室.出土文献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204-212.
- [10]磯部彰.台東区立書道博物館所蔵中村不折旧蔵禹域墨書集成:卷下[M].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費特定領域研究《東アジア出版文化の研究》総括班,2005:3.
- [11]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M].北京:中国科学院,1954:26-27.
- [12]殷光明.北凉缘禾、太缘年号及相关问题之辨析[J].敦煌研究.1995(4):179-186.
- [13]殷光明.北凉石塔研究[M].新竹:觉风佛教艺术文化基金会,2000:36-38,356.
- [14]安忠义.简论北凉石塔[M].丝绸之路.2001(1):50-52.
- [15]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宰相世系表[M].北京:中华书局,1975:3379.
- [16]令狐德棻,等.周书·令狐整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1:641-644.
- [17]释道世.法苑珠林:卷100[M].周叔迦,苏晋仁,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2889-2893.
- [18]黄永武.敦煌宝藏:第15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645.
- [19]磯部彰.台東区立書道博物館所蔵中村不折旧蔵禹域墨書集成:卷上[M].东京: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費特定領域研究《東アジア出版文化の研究》総括班,2005:101.
- [20]王三庆.日本所见敦煌写卷目录提要[J].敦煌学:第15辑.1989:98-99.
- [21]池田温.中国古代寫本識語集録[M].東京: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1990:104-105.
- [22]京都国立博物館.京都国立博物館藏品図版目録・書跡編[M].京都:京都国立博物館,1996:8.
- [23]大正藏:第1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680.
- [24]段文杰.甘肃藏敦煌文献:第1册[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151.
- [25]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4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48.
- [26]文梦霞.再论东阳王元荣领瓜州刺史的时间[J].敦煌研究.2006(2):101-105.
- [27]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8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216.
- [28]饒宗頤.敦煌書法叢刊:卷21[M].東京:株式會社二玄社,1983:75.
- [29]孙晓林.跋P.2189《东都发愿文》残卷[M]//季羨林,等.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331-335.
- [30]横超慧日.北魏仏教の研究[M].京都:平楽寺書店,1978:179-202.